

延安时期党如何推进廉政建设

□ 陈 朋

延安时期，我们党着眼于局部执政的实践要求，为预防腐败侵蚀党的健康肌体、巩固党的执政安全，把廉政建设摆在重要位置，采取一系列举措，开创了一条适合当时需要的廉政建设道路并取得卓越成效。

把思想教育摆在首位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针对当时党内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了革命信念不坚定等问题，毛泽东告诫全党要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要求党员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1938年，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开展信念教育的号召。随后，还指导党中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等制度，要求全党通过整风运动等多种形式认真抓好信仰信念教育。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坚定的理想信念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张闻天对此作了一个形象比喻，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于我们的需要正如空气之对人一样”。所以，这一时期抗日军政大学等干部学校都把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作为重要课程内容。

开展群众观念教育。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人民群众是革命的根本支持力量。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一再号召全党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认识到“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事实证明，扎实的群众观念教育，密切了党员干部同农村、工厂等一线群众的联系。比如，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党员干部不断深入生产一线，与群众一起工作，真正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赵占魁运动”中，大批党员干部深入工厂，亲身参加生产，使产量大为提高，生产成本不断降低。在党员干部的感召下，一些学校的青年纷纷来到农村、工厂等与群众最近的基层一线去工作。

注重法规制度建设

法律法规能以刚性强制约束的方式为廉政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因此，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努力推动法规制度建设。

制定具有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比如，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

“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廉洁政府的施政纲领。1939年1月至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三届参议会分别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它们虽然各有侧重，但是都将“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作为重要内容。事实证明，这些纲领性文件为廉政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制定预防惩治腐败的专门性法规。严厉惩治腐败是廉政建设的最直接举措。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我们党逐渐认识到廉政建设不能仅靠思想教育，还需要严惩腐败。为此，延安时期党建立了不少惩治腐败的专门性法规。至今广为引用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就是这一时期严惩腐败的法规典范。它们虽以预防贪污犯罪为主，但是涵盖范围较为广泛，直接促进了当时的廉政建设。比如，1938年8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将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盗窃侵占公有财物等10项行为定为贪污罪，对党员干部起到了极大震慑作用。

加强多层面多领域监督

监督是廉政建设的有力工具和重要手段。因此，延安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监督体系建设。

重视群众监督。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提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就是对群众监督的生动阐释。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明确提出，各级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群众监督，对群众的揭发“必须认真负责的、实事求是的切实查明，公平处理，切不可敷衍了事，更不可有偏袒政务人员的行为”。

发挥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的监督作用。1941年11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参议会有权依法监督和弹劾同级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也有权依法监督和弹劾同级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边区和县两级参议会还设立常驻委员会，主要履行休会期间的监督职能。

发挥党政监督。1938年，党中央决定在边区党委之下设监察委员会，主要发挥监督各级党的机关、干部及党员对党的章程执行情况等职责。1945年，党的七大规定，必要时可以设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为加强对政府各部门的监督，边区政府还设立了审计处和行政监察员公署，以此促进公务人员廉洁从政。

严格执行惩贪奖廉

古往今来，奖惩分明是廉政建设的内在要求。延安时期，我们党在推进廉政建设过程中非常注重奖惩分明。

重典治贪。针对少数人以身试法或禁受不住外在诱惑的情况，党明确提出“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比如，1937年10月，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谈恋爱未成，杀害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经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判死刑。随后，黄克功上书法庭并致信毛泽东，请求念其十年艰苦奋斗，留一条性命。对此，毛泽东坚决支持法院判决并在回信中指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刘振球拿公款购买私人奢侈品甚至与反动分子秘密往来被开除党籍、肖玉璧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被依法处以死刑等类似案件，都是延安时期严惩腐败的典型案列。这些强力惩处措施使党员干部受到了极大震慑，廉政效果明显提高。

以奖促廉。党在加大惩处腐败力度的同时，还强调对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等勤政行为的褒奖。比如，《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励暂行条例》提出“提升、记功（记大功或记功）、给予奖章奖状等、书面奖励（传令嘉奖、通令嘉奖、登报嘉奖）、物质奖励、口头奖励（当众表扬等）”六种奖励方式，并在日常工作中对廉政典型进行奖励。据统计，1938年至1944年6年内，受到奖励者就达6000多人。

俸以养廉。比如，《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对公务人员实行全面供给制，发给满足本人及其家属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资及必要津贴。事实证明，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钻营禄位、谋取特权等贪污腐败化行为。

千难万险脚下踩 枪林弹雨不后退

——甘肃省合水县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王亚强

用热血谱写了一页页光辉史篇。

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千难万险脚下踩，乐于其中；枪林弹雨不后退，勇往直前；镣铐锁身志不移，大义凛然；奔赴刑场色不变，视死如归。他们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先烈们，你们虽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献出了宝贵生命，却迎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你们的功绩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你们的英名永远铭刻在合水人民的心中，你们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把革命进行到底！

合水县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六年八月重修

合水县人民政府 二零一二年四月维修

碑文讲述了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合水，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解放战争中，先后在合水城、西华池、营房子、三塬咀、双柳树等地谱写了一页页光辉史篇，讴歌了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表达了对烈士的永远缅怀。

陕甘边红军诞生的红色热土

合水县是一块遍洒革命烈士鲜血的红色热土。1929年，刘志丹、谢子长、唐潮等共产党人在合水太白子午岭一带传播革命火种。1930年9月，刘志丹率部成功举行太白起义，打响了党在陇东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斗争的第一枪，陇东革命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1931年2月，刘志丹在合水麻峪村对三支农民武装300余人会合整编，组建了陇东第一支革命武装。9月，在合水倒水湾第二次整编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梁游击队，陕甘边红军从此诞生。10月，谢子长等人率陕北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会合。翌年的西华池起义是党在甘肃最早领导成功的武装起义。

1933年10月12日，刘志丹率陕甘红军从陕西照金奇袭合水城，震撼了国民党陇东政权，是避实就虚、智取城寨的经典战例。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工农民

主政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包家寨子举行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恢复红26军，组建第42师。这次会议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陕甘边根据地大发展的基础，在西北革命史上有重大意义。1934年4月，第42师在西华池歼灭国民党王子义团，是陕甘边最早的反“围剿”斗争。

陕甘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边区小上海”

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经合水时与宁夏军阀马鸿逵的骑兵血战合水板桥，副军长徐海东亲临一线指挥战斗。1936年12月，中共陕甘宁省委派民运工作团到合水，抗日救亡群众团体纷纷成立，合水又掀起了抗日支前新高潮。1939年12月12日，合水军民在反摩擦斗争中，摧毁了国民党县政权，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

1942年，合水军民在轰轰烈烈的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垦荒3万余亩，创办了烟草、造纸、酿酒、制药、纺织、印染等工厂。合水境内5000多名妇女参加纺纱织布。仅一年多时间，驻军和政府就实现了自给，涌现英雄模范150多名。西华池镇有私营商号企业达百余家，党政军公营商业企业30余家，日销售食盐4万多斤，交易牲畜百余头，成了边区西部贸易口岸，被誉为“边区小上海”。在整个抗日救亡运动期间，合水人民积极救伤员、运物资、修工事，组织抗日自卫军反特锄奸，军民团结保卫了陕甘边区的西南大门。

西华池战役拉开了西北解放战争的序幕

1947年2月，蒋介石调集25万军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28日，胡宗南部第17师第48旅进占合水西华池。为保卫延安和党中央，3月4日，



以对革命的坚定诠释伟大建党精神

□ 杨文森

年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一致而脱党，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没有变，仍以实际行动支持党的事业：“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高度历史自觉。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自觉肩负起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毛泽东1919年在《湘江评论》中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925年又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写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李汉俊年轻时就萌生拯救国家民族的念头，他说：“我们求学是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扬眉吐气而出力。”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需要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毛泽东、董必武等人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号召民众进行坚决斗争。当年11月，中共鄂东特委举行黄麻起义，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号召工农开展武装斗争。抗战时期，董必武长期在国统区工作，领导创办机关报《新华日报》，与国民党斗智斗勇，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矢志奋斗。王尽美临终前留下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这种强烈的初心使命意识至死不渝。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钢铁革

命意志。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从1921年至1949年，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有370多万人。其间，中共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共170多人，42人牺牲，约占1/4；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共55人，15人牺牲，约占1/4；党的一大代表13人，5人牺牲，占1/3以上。王尽美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虽身染肺结核，仍到北京、济南、青岛、上海、广州等地组织工人运动。1925年病逝，年仅27岁。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当局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李汉俊利用担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和省党部青年部部长的身份，将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先进分子全部营救救出，他因此被军阀胡宗铎以“共产党首领”等罪名逮捕并秘密杀害，时年37岁。

邓恩铭1929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而毫不畏惧，发动两次绝食、两次越狱，使7名同志脱险，自己却因身体病弱未能逃脱，1931年被国民党杀害，留下诀别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惟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九泉。”何叔衡是一大批中青年最大的，他说：“作为共产党员就应该是不怕死的。我们从入党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党。”红军长征后，他留守苏区，在敌人的“围剿”中艰苦转战，1935年在长汀突围中身负重伤，拼死反抗，壮烈牺牲，践行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陕甘宁部队集中三个旅两个团，发起了著名的西华池战役，击毙第48旅旅长何琦等1500余人，缴获三门大炮和大批枪械。参战的新四军新4旅和358旅此役后整编为装备精良的我军劲旅。

西华池战役是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前的侦察战，也是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以后我军首次大捷，揭开了边区保卫战的序幕。彭德怀在西华池战役后，判断国民党军定会反攻，及早调整了军事部署，为延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主动。

解放战争时期合水军民坚持“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武装斗争，向人民军队提供兵员1000多名，粮食10万多石，清油5万多斤，军鞋1.4万双，出动担架300副，畜力2000多头，配合支援西北野战军大小百余次战斗，为解放大西北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潭秋在早年游击战中英勇负伤、失去右耳，1943年被捕后，敌人以站火炭、杠子夹、“坐坦克”“坐飞机”等酷刑逼迫他脱党，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当年9月被秘密杀害。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他们以恒心守初心、以生命赴使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和英雄气节。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鲜明政治品格。我们党一路走来，历经无数艰难磨难，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党员的忠诚和人民的拥护。邓恩铭怀着通过共产主义救中国、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志向，三次入狱、宁死不屈，用一腔热血诠释了对党忠诚的伟大品格。陈潭秋在党中央指示在新疆工作的党员撤离时，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充分展示了共产党员的忠诚和高风亮节。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强调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并在党的七大上提议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写入党章。他最不能容忍官员鱼肉百姓，专门警告：谁搞腐败就割谁的脑袋。坚决宣示了不负人民的政治承诺和深厚情怀。董必武总是把自己视为人民公仆，常说：“我们的党是为群众利益服务的，如果不为群众服务，还要组织共产党干什么？”叶剑英评价他“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